



清华东方文库

李廷江 王中忱 主编

晚清中国 社会变革与日本

·李廷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晚清中国 社会变革与日本

李廷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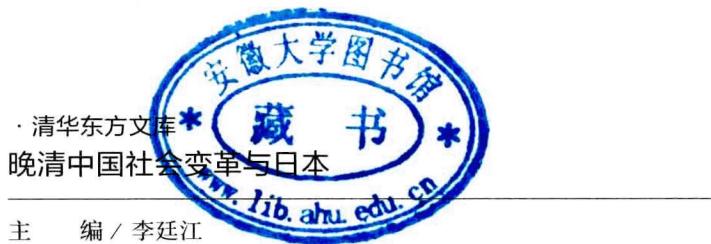
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 / 李廷江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2

(清华东方文库)

ISBN 978-7-5097-6939-3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发展史 - 中国 - 清后期 - 文集
IV. ①K2-53 ②K252.03-53 ③K313.4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9275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责任编辑 / 马续辉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12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939-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清华东方文库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画)

入江昭	大塚豊	王中忱	王 成
王亚新	毛里和子	平野健一郎	冯 峰
西村成雄	刘岸伟	刘建辉	刘晓峰
杨 舰	李当歧	李廷江	张启雄
季林红	赵全胜	胡洪营	袁本涛
晏 妮	高 柏	黎 宏	

主 编
李廷江 王中忱

执行编辑
李 佩 丁兆中

前 言

李廷江

《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一书，从准备的那一刻开始到今天，经历了几个春秋，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付梓，呈献在读者面前了。

今年，是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120 周年。就 120 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日本”是个老而新的大话题。两甲子的岁月风雨，记载了中日两国以铁血干戈为主的前 60 年，以及以互利互助为主的后 60 年的历史，也包含了在今天的东亚世界里，中日两国之间充满了不信与纠结的战略互惠的现实。

本书探讨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以及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的诸多事例。其中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 4 篇论文，虽然与大多文章有时间差，但是考虑到其内容与主题相关，编辑收入合为一本，会更有利于读者对今天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内在的理解。这样一来，从时间和内容上，似乎也可以说，本书讨论的既是清末时期的中日交流史，也是从清末到今天的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书汇集的 20 篇论文，围绕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日本因素和影响，从政治、外交、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艺术、思想、宗教、宪法、电影、学术史和概念史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其中 9 篇论文考察了同时代的 10 位中日美三国的代表人物，有中国的思想家严复、革命家何天炯、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作家周作人，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日本海军情报

军官八角三郎、中国问题专家内藤湖南、佛教家小栗栖香顶、画家渡边晨亩和美国商人汤普森。另外的 11 篇论文，有《日韩合并在华反响及其对清末宪政改革进程的影响》《日本“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以黑龙会为中心》《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顾问》《再论亚洲主义的方法》《博物馆里的辛亥革命与中日关系》《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互相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介绍几本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抗战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研究的专著》《日本电影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战后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紧张和合作的现代史》《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共同体理论的演变》。就时期而言，有 10 篇论文主要研究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6 篇论文是民国初期，其余 4 篇聚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应该说，能够从如此多的角度抓住主题，展开讨论，这是一本跨度大，内容丰富，系统研究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的学术论文集。

通读本书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尽管每篇论文主题不同，但是 20 篇论文贯穿了分析日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之主题，至少涉及四个方面。首先，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中日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对此，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还是民国以及其后的各个时期的大量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辛亥时期的日本顾问以及日本海军八角三郎有关重建中国海军的设想的时代背景，就是最好的注脚。其次，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在改变着中国外在的国际环境，持续不断地影响中国的社会革命。比如，日韩合并对中国影响极大，它不仅使本来就十分微妙的三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是作为改变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政策格局的重大事件，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再次，日本社会的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左右了中国各阶层对日本的理解和认识，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例如，辛亥革命之后杨守敬的变化和严复在民初关于权威主义和法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以及周作人与《顺天时报》的关系，应该称为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最后，日本人中一部分关注中国的团体和个人，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中国事务，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革。比如，

作为团体的日本“黑龙会”，以及作为个人的“东亚先觉志士”，还有法学家有贺长雄，佛教家小栗栖香顶和画家渡边晨亩等人都应该视为这类人。同样的事例，在本书中和历史上则是不胜枚举。

从内容上，日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上述影响可以归纳如下：（1）内在影响和外在影响；（2）局部影响和整体影响；（3）主要影响和次要影响；（4）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一般而言，大凡短时段的政府政策的影响，多数属于外在的、局部的、次要的和短期的。李细珠在考察了日韩合并对清末宪政改革进程的影响后，意味深长地指出，面对日韩合并的国际形势，尽管中国朝野反应强烈，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实际效果。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则更多表现为内在的、整体的、主要的和长期的。当然，从本书所收的论文来看，历史也证明，这四种影响是相对的，同时也是交叉和重叠的；是综合的，同时也是正面与负面交融的。很难简而言之，不可以偏概全。比如说，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以及互相影响的事实、严复关于权威主义与法制之间的认识、有贺长雄参与民初制宪活动的影响以及亚洲主义的话语变化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学术内涵。另外，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近代东亚佛教共同体的构想、日本画家渡边晨亩对民国时期北京画坛的影响，同样没有完全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通过对中日交往的实证研究，也澄清了历史上一直模糊不清的事实。如杨守敬，在对待辛亥革命以及新政府的问题上，持有保守态度，但是应该承认，他为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数据以及研究方法方面都有极大的贡献。他只是为了保护古籍才和日本军人寺西秀武交往的真实目的，越来越清晰地为后人了解。他以一生之力，搜集刊书的精神和贡献，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得到社会的客观评价。发掘新资料，澄清历史疑难，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 1972 年以前为止，在美苏冷战背景下，中日两国处于无邦交状态。1972 年，中日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1978 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向外学习和交流的大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有关其后 30 多年来中国与日本交流中的相互影响，十几年前就有人注意，观点新颖，颇有分量。这是个值得做大文章的题目，期待日后会有更多的人关注。本书中 4 篇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文章，同样涉及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国社会变革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如，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残酷后果，日本电影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电影界的影响，还包括日本的中国研究对当代东亚共同体理论发展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对东亚社会的影响等。

诚然，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外来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国社会的变革记录，程度不同地留下了无数先辈、志士仁人走向世界的学习痕迹。打开国门，适应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乃 19 世纪直到今天的时代特征。那么，如此特别强调日本的影响是否适宜呢？同时，梳理日本影响的过程中，又应该如何认识日本影响的原因和意义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首先，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中国经历了两场最大的战争，1894 年的甲午海战和 1937 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日本是主要敌人。其次，1895 年甲午海战以后，清政府推行了两次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1898 年的戊戌变法以及其后推行的清末新政，日本是主要的效仿对象。孙中山先生讲过，辛亥革命就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邓小平也曾说，我就是看了日本的新干线，更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即便在今天，国人观光访日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感受到了在今后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仍然有继续参考学习日本的必要。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千多年来，两国在历史、文化、思想和宗教等方面方面面，有着密切友好的交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富国强兵，脱亚入欧，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面。当然，作为日本发展的负面历史，到 20 世纪中叶，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和伤害也同样永远铭刻在历史上。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其经验和教训，都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冷静客观学习历史，虚心认真求教他人，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心态。本书作者们，从中国社会变革与他者的视角，立足于用事实、资料说话的根本，在一些迄今鲜为人们注意的课题和分野，提出了很多令人耳

目一新的新见解，难能可贵。在此，谨向本书作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时浅，香山会议作为每年一度的学术交流平台，有幸承蒙学界同仁的信任和鼎力支持，开始慢慢地显示出其学术性、交流性、开放性和建设性的特点，得到了越来越多海内外学人的认同和厚爱，对此，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期望本书作为香山会议的第一册文集，像一把刚刚点燃的火炬，一点儿一点儿地发光发热。

2014年11月吉日 于哈佛大学

目 录

日韩合并在华反响及其对清末宪政改革进程的影响	李细珠 / 1
日本“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	
——以黑龙会为中心	胡连成 / 29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顾问	李廷江 / 36
有关有贺长雄民初制宪活动几个史实的辨正	尚小明 / 54
八角三郎的重建中国海军论	
——民国初期一位日本情报军人的中日提携观	冯青 / 70
何天炯：辛亥革命个人史的书写与记忆	李长莉 / 81
辛亥革命之后的杨守敬	陈捷 / 96
再论亚洲主义的方法	姜克实 / 105
博物馆里的辛亥革命与中日关系	马晓华 / 114
日美中国通对辛亥革命的不同展望	
——内藤湖南与 J. S. 汤普森的比较	陶德民 / 127
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	
——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	新保敦子 / 138
他山之石	
——浅析日本花鸟画家渡边晨亩对民国时期北京画坛的影响	战晓梅 / 160
近代东亚佛教共同体之构想	
——小栗栖香顶《北京护法论》之考察	陈继东 / 176
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	
——以“民主”与“共和”为例	陈力卫 / 214

日韩合并在华反响及其对清末 宪政改革进程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细珠

在近代东亚历史上，中、日、韩（朝）三国的关系颇为微妙。其中，日韩合并更是改变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不能置身事外。那么，中国究竟如何反应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有何影响，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学界以往相关研究不多。值得关注的论文有两篇：一是台湾学者张存武先生关于中国对于日本亡韩反应的专题论文；二是大陆学者邹振环先生有关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的论文。^①另外，在一些关于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清韩外交关系史研究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②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中国人对于韩亡的同情、哀惋以及对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谴责，而较少注意国人自身的反省及其对中国内政改革的影响等问题。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一般民间舆论，革命派、立宪派人士的反应，清政府官员的应对策略，以及朝野互动关系等多个层面，对此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以期从东亚国际关系变动这一更加广阔的视野，力图在近代中

* 本文为2008~2009年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曾得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东洋历史系金衡钟教授、丘凡真教授多方帮助，特此感谢。

① 张存武：《中国对于日本亡韩的反应》，《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第382~407页；邹振环：《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5~355页。

② 王元周：《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61~79页；蔡建：《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205~208页。

国历史序列上书写日韩合并这样的国际性事件，为观察晚清政治史尤其是宪政改革史提供新的视角。

一 报刊媒体反映的一般民间舆论

对于日韩合并，中国朝野究竟如何反应？其时，革命党人戴季陶有严厉的批评，有谓：“朝野上下，一若毫不相关者，报章既不登载其内容，舆论亦不研究其利害，吾诚不知其何识见之陋而眼光之小也。”^① 戴氏痛切言之，意在警醒国人。中国朝野果真反应这般冷漠吗？其实情并非如此。这里拟先从《大公报》《申报》《时报》《香港华字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考察一般民间舆论的反应。

浏览清末报刊的强烈印象，恰与戴季陶批评的情形截然相反。其时，不但各种报刊大量登载有关日韩合并的消息，而且民间舆论对于其与中国前途命运的利害关系也多有探究。

日本图谋侵略与吞并朝鲜，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中日甲午战争。其时，《马关条约》解除了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标榜“独立自主”的大韩帝国成立（1897年），日本侵略势力不断向朝鲜半岛渗透。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变朝鲜为其保护国，其吞并朝鲜的步伐进入实质性阶段。对此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关节点，中国报刊舆论均予以密切关注，并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在不断地报道日韩合并历史诸多面相的过程中，报刊媒体所反映的一般民间舆论可谓纷繁复杂。具体而言，除了同情韩国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的情感因素以外，大致尚有三个方面的理性思考。

其一，对韩国灭亡原因的分析。

在清末，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乃社会进化之极则。近代中国人本来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但在分析近邻韩国灭亡的原因时同样也离不开这具体的语境。在他们看来，大韩帝国存在仅十余年（1897～1910年）便至灭亡，这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结果，但更有韩国自身内在的原因。《大公报》发

^①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30页。

表《哀韩篇》，在感慨“日本以同文同种欲扶植之使独立者，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胡为而竟至于此耶”的同时，竟然又认为：“亡韩国者韩国也，非日本也。在公理上韩国为应亡，在天演上韩国为尤应亡。”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然而，作者真正深感痛心的是韩国内部的腐败与不可救药，有谓：“闻韩国之危险亦屡经不一经矣，乃经一次危险，则为一次之痛哭流涕，下诏罪己，成为例事。曾未几时，朝野晏然，歌舞升平，境过情迁，转瞬已成极乐世界。卖官鬻爵，朘剥民，古赋新诗，竞夸风雅，汉宫唐苑，竭力经营，门户激成冰炭，萧墙时伏干戈，依赖之心为惟一之经济，排外媚外，毫无成算，军事不修，外交不讲。窃叹韩国之君臣上下，处何等时势，居何等地位，顾漠然不动其心，一至于此。”^①

在时论看来，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不能自立自存。一方面，是外交上长期奉行所谓事大主义，企图依赖强邻，而不能真正地独立自主。这或许是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尴尬，但终于逃不脱灭亡的命运。正如《香港华字日报》所谓：“高丽亡国，惟不自立之故。数十年来，皆以倚赖强邦为政策。初则倚赖中国，继则倚赖俄罗斯，终则倚赖日本。卒之，凡彼之所谓倚赖者，皆倾宗覆社之渐也。……高丽所以致亡之故，即亡于不能自立，而待他人之庇我扶我。”^②另一方面，是内政上不能自强。在此弱肉强食的时代，不能发奋图存，必然走向覆亡之路。“高丽之亡，虽由其政治不修，盈廷昏聩，酣嬉优游，落沸金而不知，居焚堂而大睡，不知亡国之祸，其机伏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其祸遂见之于数十年之后。然此数十年之中，邻国之谋我利权，攘我土地，未尝无形势之发露，未尝无迹象之可寻，苟能未雨绸缪，惧危懔灭，当此强邻觊觎之际，愤发为雄，急图补救，或可稍延国脉。乃于甲午以后贪独立之荣名，而一切国政仍听其腐败而不整顿，识者早知其不亡于日，即亡于俄也。今也果亡于日。”^③所以，韩国虽然被日本所灭，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实际上无异于自取。

① 《哀韩篇》，《大公报》1907年8月19日第3版。

② 《哀高丽》，《香港华字日报》宣统元年十月四日。转引自赵中孚、张存武、胡春惠主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册，国史馆，1987，第490页。按：本文转引该书资料，标点或有改动处，以下不一一注明。

③ 《论高丽亡于日本》，《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册，第401~402页。

灭亡。

其二，对日本殖民侵略手法与阴谋的揭露。

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法很是隐秘、阴毒。虽然经过两次惨烈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但表面上看来，这两次战争的对象分别是中国与俄国，而并不是朝鲜。而且，日本还打着保护朝鲜独立与维持东亚和平的旗号，甚为蛊惑人心。对此，中国报刊舆论多有揭露。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时论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从此亡国了，有谓：“甲午之役，日本因高丽与中国开衅，马关议和非认高丽为完全自主之国耶？何图日俄之役和议告成，高丽归日人保护，派伊藤总监握其政柄，撤各国驻使，外交悉委诸日本。查日俄宣战诏有云：扶植韩国独立。独立者，完全自主之谓也。何图日本竟食前言，不顾公理，阳以维持东亚平和为名，阴行其攘夺利权之术，而高丽从此亡国矣！”^① 果然，不出几年，日本吞并韩国之真相便大白于天下。其所谓“保全”“维护”云云，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而已。时论有云，“当其初时，日本之宣布于各国曰：保存韩国之领土也！维持韩国之独立也！巩固韩〔国〕皇室之尊严也！今则所谓保存韩国领土者，而其领土已并入日本矣。所谓维持韩国独立者，今已将其一切独立之主权让与日本矣。所谓巩固韩国皇室者，今已降为准皇族矣。……盖保全与巩固云者，乃并吞攘夺之别名者也。”^② 这便一语戳穿了日本殖民侵略手法既虚伪又阴险的把戏。

不唯如此，中国报刊媒体还进一步揭露，日本殖民侵略的目标不仅是韩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并称霸东亚。有日本政界要人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赤裸裸的表白为证。据《大公报》披露，“大隈重信有言曰：伊藤为朝鲜统监，吾当为清国统监。伊藤博文有言曰：对韩问题今已解决，此后对于清国，一宜预备军务，二宜预备财政，三宜预备外交人才，有此三者，何难执牛耳于东亚！”^③ 日韩合并时，《时报》记者便敏锐地指出其并吞韩国一进逼满洲一瓜分中国的阴谋。有谓：“抑记者犹有虑焉，自甲午一役之后，

^① 《论高丽亡于日本》，《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册，第401页。

^② 《韩鉴》，《香港华字日报》宣统二年八月十四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册，第527页。

^③ 《韩学生上淘贝勒书》，《大公报》1910年11月13日第2张第4版。

日韩连合之名词，乃发现于世界中；自日俄一役之后，满韩连合之名辞，又发现于世界中。今者日韩关系既经解决矣，所未解决者满韩关系而已。吾不知政府诸公，其对于此日韩合邦草约，将视之为隔岸观火乎？抑视之为同舟遇风乎？夫以满与韩较，韩之结果在并吞，满之结果任其所欲，亦不过出于割让，似满不如韩之惨。然而今日为均势时代，彼既攫得一脔，此亦思分我一杯羹，浸假而列强效尤，则大局不堪设想矣。然则此一草约也，谓为进逼满洲过渡之桥梁也可，即谓为瓜分中国开场之楔子也亦无不可。”^① 其实，在日韩合并的同时，日本还与俄国签订协约，已把侵略触角进一步伸向中国东北地区。《申报》转载《纽约时报》评论韩国近来之变局称：“俄日协约，实为分割及并合满洲之入手办法。”^② 可见，日本并韩之后的侵华阴谋有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及其出路的思考与探究。

一般民间舆论关注日韩合并，无论是探究韩国灭亡的原因，还是揭露日本殖民侵略的阴谋，归根结底，均着眼于对中国自身前途与命运的忧思。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与出路问题，报刊媒体所反映的民间舆论大致提供了两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是以韩为鉴。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与韩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韩国却迅速走向覆亡。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俄战争后，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中国留日学生潘子寅归国途经朝鲜海域，闻讯愤极，蹈海而死。《大公报》将潘君与反对日本取缔规则的革命烈士陈天华相提并论，认为：“潘君之死为痛韩之将亡而死也，为痛韩之将亡，恐世界上有为亡韩之续者而死也。”面对举国麻木不仁的现象，潘君之死，意在警醒国人。“潘君之思想，犹冀官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故不惜以一人之身，而激发全国之聩聩焉。”^③ 在一般舆论看来，韩国的命运就是中国的缩影。如《香港华字日报》所云：“此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中，国不兴则亡，断无中立之理。亡韩之现象即亡中

① 《读日韩合邦草约有感》，《时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5册，第141页。

② 《西报译要·美报论满洲之前途》，《申报》1910年9月2日第1张后幅第2版。

③ 《论陈潘两烈士之死节》，《大公报》1906年1月16日第2版。

之小影，彼日使林董氏尝以此意警告中国人矣。于此而不引以为鉴，夫岂尚有心肝者哉？”^① 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如果不能以韩为鉴，就可能重蹈韩亡之覆辙。

另一方面，是立宪自强。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救亡图存始终是仁人志士最迫切的愿望。如何救亡图存，则不同的政治势力有不同的政治主张。除了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革命派报刊以外，就其他报刊媒体所反映的一般民间舆论来看，大多主张温和的改良，基本上同当时的新政与立宪的潮流相一致。日俄战争的结局，立宪战胜专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立宪的正面标本。相反，韩国的灭亡，却是一个反面的例证。《香港华字日报》认为：朝鲜、安南为中国同洲、同种、同文之国，两国一时皆亡，正因不立宪之故。“天下无立宪可亡之国，以国能立宪则君民共主，其君可囚而其民不能尽囚也，其君可废其民不能尽废也。若专制君主，则以其国为一人之私物，但取其君而亡之则国亦与之俱亡矣。如安南，如朝鲜，非近日亚洲亡国之绝好榜样乎？”^② 然而，当时中国不正在大搞新政、立宪吗？对于清政府的新政，报刊舆论啧有微言。《大公报》以韩亡为鉴，认为韩皇也曾召见群臣，谕以变法维新，但宣誓之后，仍是因循如故，而并不励精图治，不过自欺欺人而已。所以，“伪新政”不能救亡。^③ 中国不新政不行，假新政也不行；不立宪不行，假立宪更不行。《香港华字日报》认为，处 20 世纪之专制君主必须变政，“丁此民权发达时代，天下虽有极专制之君主，不为国计，亦当自为位计，而竟思以‘变政’二字，为对付亡国之败阵镜矣。然不变固亡国，不善变亦亡位。”当时列强帝国之所以强大，“惟先立宪之故”。列国皇位之所以稳固，“惟真立宪之故”。故变政即立宪，善变政即真立宪。至于“不变”与“不善变”的结局，则可以东亚之韩国与西欧之葡萄牙两国为鉴。“不鉴韩皇，不知亡国之惨祸；不鉴葡王，不知失位之痛心。然鉴韩皇而不知自鉴，行将作韩皇之再续；鉴葡王而不知自鉴，必将步葡王之后尘。”因韩皇不知变政，韩国被日本吞并；因

① 《论袁世凯请政府引韩为戒》，《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 册，第 434 页。

② 《亚洲同时两大休目事》，《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1 册，第 432 页。

③ 《哀亡韩》，《大公报》1910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葡王变政不善，葡萄牙发生民主革命，葡王失去君位。韩、葡两国，“洵现世君主之宝鉴也”。^① 显然，在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形势下，一般民间舆论多希望其实行真正的立宪。

二 革命派、立宪派人士的观察与反应

与清政府相对而言，革命派与立宪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两股重要势力。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派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股势力互争雄长。可以说，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

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如何看待日韩合并，以及日韩合并对其政治策略有何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下面拟分而论之。

关于革命派人士的观察与反应。张存武先生以《民吁报》为基本资料，着重论述了革命党人对伊藤博文被刺的反应：痛斥日本对韩国的贪残暴虐以及伊藤博文监韩时的淫威，赞美安重根的爱国英雄之气，哀叹中国人面临亡国危机而不觉悟。^② 这些论述，主要还是关注其爱憎悲喜的情感因素，而尚未涉及其理性诉求。

其实，进而论之，《民吁报》之所以关注伊藤博文被刺事件，其目的在于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并警醒中国政府与国民。伊藤被刺后，《民吁报》认为，日本必将吞并朝鲜，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中国。“又将与俄协商，瓜分我满洲，得满洲之后，吾知日本之野心，犹未有艾也，势必又将伸手于蒙古，中间再有各国之利益均沾，而我庞大之帝国，势将分为十数之朝鲜。”为此，《民吁报》特别提醒：“我今日哀朝鲜，又窃恐后日他人之哀我也。我政府何以为计，我国民何以自处，勿使以哀朝鲜者之转而自哀，则幸甚矣！”^③

^① 《不变政欲试看韩皇 变政欲试看葡王》，《香港华字日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三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册，第531页。

^② 参见张存武《中国对于日本亡韩的反应》，《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391~396页。

^③ 《哀韩国》，《民吁日报》1909年11月9日。转引自《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5册，第43~45页。